

全球華語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Review and Prospect of Global Chinese Studies

◎ 刁晏斌

提 要：立足於體系建構與本體研究，對四十年來的華語研究進行回顧，前者主要圍繞主體概念的“名”與“實”，以及核心概念和子概念體系進行介紹；後者則從事實和理論兩個方面對相關進展加以梳理。在“前瞻”部分，主要立足於“拓展”與“加深”，從華語事實的全面發掘和華語理論的進一步探索兩個方面，討論了今後華語研究的發展方向和目標。最後指出，華語研究的學術願景與追求是要把它當成一門學問來做，並且最終做成一門“立地頂天”的真學問、大學問。

關鍵詞：全球華語；全球華語學；研究綜述

Key words: global Chinese; global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review

全球華語研究從開始到現在約有 40 年的時間（祝曉宏、周同燕，2017），跟其他方面的語言研究相比，這實在是一段不長、甚至很短的時間。但是，就這一研究領域本身而言，卻是發展迅速、成果迭出，特別是進入本世紀以來，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和突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華語研究已經成為語言、語言學及相關研究中最具活力、最有發展前景的一個重要領域。

“年屆不惑”的華語研究，一方面已經出色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積累”，取得了眾多令人矚目的成果，這無疑非常值得總結和回顧；另一方面，其

在邁向“知天命”“耳順”等的過程中，還有許多需要繼續探索和不斷加強的方面，以及進行前瞻性的規劃與設計。本文作者不揣淺陋，試圖在以上兩個方面給出我們自己的思考與認識，以求教於通人方家。如標題所示，本文討論對象為全球華語研究，為了行文簡省，下文均以“華語”稱之。

一、回顧：體系建構與本體研究

目前所見，已有不少華語研究的回顧總結之作，比如祝曉宏、周同燕（2017）和王曉梅（2017）分

別立足於國內與國外，進行了很好的梳理；祝曉宏（2021）將視線進一步下移，圍繞近十年華語研究的“主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歸納總結；沈索超、王輝（2022）利用 CiteSpace 軟件，從多個角度對 1998—2020 年間的研究情況進行了可視化可視量分析。此外，我們最新看到，盧月麗（2022a）開啟“年度總結”模式，對 2021 年度的華語研究進行了較為全面、細緻的回顧總結。

以下，為了避免與上述文章重複，同時也結合筆者關注的熱點與焦點問題，從“體系建構”與“本體研究”兩個方面來回顧以往 40 年的華語研究。

（一）華語的體系建構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指出，系統是指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的若干組成部分結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而在現代這樣一個高度組織起來的社會裡，複雜的系統幾乎是無所不在的（錢學敏，2004）。我們認為，華語就是幾乎無所不在的複雜系統中的一個，而它的知識建構，則是圍繞華語學科體系所作的積累，其具體的表現方式就是華語概念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刁晏斌（2017a）提出“全球華語學”概念，並對建立這一概念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進行了討論；劉善濤、黨懷興（2020）也撰文指出，“全球華語學”建設勢在必行。我們認為，相關的體系建構均可納入全球華語學範疇。

按我們的理解和劃分，華語概念體系大致是一個由主體概念、核心概念和子概念構成的層級系統。以下大致就按這一劃分來進行研究情況的梳理。

華語概念系統的主體概念當然是“華語”，而它也一直是華語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內容主要集中在“名”與“實”兩個方面：前者試圖尋求一個合適的概念承載形式，後者則對其內涵進行探究。

就“名”而言，我們所見的概念指稱形式，

有“漢語”系列的“漢語、大漢語、國際漢語、全球漢語”等，也有“華語”系列的“華語、大華語、全球華語”等（刁晏斌，2018：2—15），而現在普遍使用的是“全球華語”或“大華語”。

就“實”而言，則是經歷了一個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表現出明顯的發展性。比如，郭熙（2011）自述其全球華語定義的三次變化，分別是“以普通話為標準/核心/基礎的華人共同語”；陸儉明（2005）將“大華語”定義為“以普通話為基礎、而在語音、詞彙、語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彈性、有一定的寬容度的漢民族共同語”，而到陸儉明（2015）則改為“以普通話為基礎而在語音、詞彙、語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彈性、有一定寬容度的全球華人的共同語”。上述從“標準”到“核心”，再到“基礎”，就是自我調整甚至糾錯的過程，自然體現出對華語自身及其與普通話關係認識的不斷深化；而從“漢民族共同語”到“全球華人的共同語”同樣也是如此，體現了陸先生對華語屬性認識的變化。現在，比較通行的華語定義是“以普通話為基礎的華人共同語”（郭熙，2011），以及“以普通話／國語為基礎的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李宇明，2014），就後者而言，顯然也是在已有研究和表述基礎之上調整與發展的結果。然而，上述對華語內涵的表述，隨着學界對華語瞭解的日益全面和認識的不斷加深，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和調整的必要，這一點下文再作討論。

關於華語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其子概念，有的綜述類文章也已涉及，比如上引祝曉宏（2021）概括了近十年華語研究的八大主題：華語學科、華語事實、華語規劃、華語傳承、華語傳播、華語接觸、華語社區、華語生活。除“華語事實”屬於本體研究，其他七大主題基本均屬體系建構的範疇；沈索超、王輝（2022）則提出，華語研究主題主要集中在華語本體、華文教學、全球華語、華語教材、華語社

會使用等方面，也基本列出了華語體系建構的主要內容，其中包含了很多原創性的成果。

著名華語研究專家郭熙在最近的一次學術報告中，列出了華語研究中初步形成的八個概念群，可以看作對華語核心概念及其子概念的一次系統梳理。這八個概念群是：華語及華語產品、華語性質、華語傳承、華人及其組織、華語傳承路徑和影響因素、理念、華語傳承性質和特點、傳承傳播策略。^[1]上述每一個概念群都包含數量不等的具體概念，因此它們基本屬於核心概念的層次，而其下所包含的具體概念則可以看作子概念。比如，僅第一個概念群“華語及華語產品”中，就包括“華語、大華語、全球華語、華文、中文、漢字、漢語、祖語、華語歌曲、華語電影、華語片、華媒、華文報刊、華樂、區域華語、南洋華語、坡式華語、居鑾華語、暹達華語、華語規範”等。雖然其中有的並非在華語研究中首次提出，但也確有不少是這一研究中新生、且投注很多精力進行探究的概念，如相對宏觀的“大華語、全球華語、祖語”，以及比較微觀的“居鑾華語、暹達華語”等。其他各“群”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另外，有些子概念之間具有派生關係，由此就形成了具有上下位關係的概念鏈，這一點下文再談。

如果說上述八個概念群還可以進一步歸納、總結為幾個更具內部一致性和外部排他性，以及相互之間聯繫密切的核心概念的話，那麼郭熙、雷朔（2022）已經做了這樣的工作，文中指出，工具性、資源性和文化遺產性，構成了對海外華語認識的新框架，而這也就是說，把工具性、資源性和文化遺產性作為華語主體概念下的核心概念。

在 40 年的發展中，華語的體系建構呈現出明顯的“在探索中發展、在前進中提高”特點，這一方面創造了一種新的、非常獨特的研究及發展模式，

使得研究者與對研究對象的認識及新的學科體系共同成長；另一方面也形成一個獨具魅力的新思想、新觀念、新方法、新研究範式等的試驗場、用武之地和展示窗口。比如對華語的層級劃分，從吳英成（2003）的“內、中、外”三圈，徐杰、王惠（2004：19）的六層次“連環套”，到徐大明、王曉梅（2009）的“核心、次核心和外圍”三區，再到李宇明（2014）的“兩層級六層次（或五層次）”構造，以及刁晏斌（2018）的“普通話圈、國語圈和華語圈”，就是非常生動的體現。

華語是一種獨特的、豐富的、寶貴的語言文化資源，是上天給予華語研究者的一份厚賜，由此不僅可以出成果、出理論、出方法，並且也使相關研究最有條件和可能成為普通語言學理論的增長極，成為相關研究者為人類語言學做出傑出貢獻的突破口和主戰場。上述華語體系建構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和證明了這一點，並預示了更大的發展前景。

（二）華語的本體研究

作為體系建構的華語研究，側重於理論性、應用性和綜合性，並且多跟其他學科以及社會生活、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結合，因此或許可以稱之為“大語言研究”；而另一方面，還有很多具體的研究則立足於語言或語言變體本身，同樣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也非常值得總結和回顧。一般而言，立足於具體現象和問題的語言研究，通常都在“事實”和“理論”兩個維度上展開，所以下面我們就主要從這兩個方面進行梳理。

首先，看語言事實發掘方面。

已有綜述類文章以及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一些學位論文文獻綜述部分，往往都會重點介紹這方面的研究情況，為了避免重複，以下我們換一個角度，對華語本體研究總體的傾向性及其比較明顯的具體

表現，進行歸納總結，這裡用三個“集中”來概括：

第一，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普通話與非普通話的對比。具體而言就是普通話圈與國/華語圈的對比，通過對比尋找和明確二者之間的差異，以此來顯示後者的變異及特點，並在一定程度上對其進行解釋。

第二，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詞彙方面。以上所說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普通話與非普通話的對比，而這樣的對比又主要集中在詞彙領域，其他方面如即使與語法相關的內容也主要集中在虛詞的用法等，關注的重心主要是此有彼無或彼有此無，以及同形異義或同義異形等“顯性差異”。

第三，研究的對象區域主要集中在臺灣和新馬。如果作一個兩階段的劃分，前一階段大致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主要集中在海峽兩岸民族共同語之間的對比研究；後一階段則基本始於上世紀末，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地區，而在東南亞則又進一步集中在新馬地區。

如果說，以上三個方面的特點與表現既有其合理性，同時也有較為明顯的局限性的話，那麼，我們高興地看到，最近幾年出現可喜的改變，產生以下幾個發展苗頭或趨勢：

第一，由共時研究到“共時+歷時”研究。徐威雄（2012）提出“馬新華語史”概念，刁晏斌（2017b）在此基礎上正式提出並較為全面地論述了“全球華語史”，倡導在共時研究之外還應加大力度進行歷時研究。近年來，華語的歷時因素越來越受重視，其在具體研究中的表現主要有二：一是作為相對獨立內容的專門性研究，如邱克威（2014），刁晏斌（2020a、2021a、2022a），盧月麗（2020、2022b、c），王文豪（2020），李權（2020、2022），李計偉、劉燕婧（2021）；二是在某一或某些現象的共時研究中加入歷時因素的考察與分析，比如在對當今華語的某些獨特現象進行溯源時，與上

世紀中葉之前的早期國語聯繫起來，李計偉（2012、2018、2022），王彩雲（2015、2016），刁晏斌、侯潤婕（2016），刁晏斌（2022b）等大致都是如此。

第二，由差異研究到“差異+融合”研究。在華語研究中，“融合”早已不是一個“新詞”，比如刁晏斌（1997）就提出並討論了不同區域的漢語之間的融合問題，而我們20多年前研究海峽兩岸語言對比的專著也以“差異與融合”為名（刁晏斌2000）。近年來，結合融合現象及其表現的華語研究偶能見到，如邵敬敏、劉杰（2008）、盛玉麒（2012）、蘇金智、王立、儲澤祥（2015）；而專門以“融合”為考察對象和討論話題的研究也已開始出現，如刁晏斌（2015a、2017c、2022c）、王曉梅、張欣怡（2019）、洪爽（2022）等。

第三，由離散性研究到“離散性+集成性”研究。這裡的“離散”指的是把語言事實當作一個個相對孤立的個案或對象而進行的研究，現有的各類成果多屬此類；而與之相對的“集成”，則是基於某一視角進行歸納後的具有“類化”性質的研究。近年來，有人開始嘗試進行後一方面的研究，試圖由此揭示華語現象某些新的特點和規律。比如，李行健（2013）着眼於海峽兩岸詞彙差異的“顯著”程度，提出了“顯性差異”與“隱性差異”概念，但未能進行系統的後續研究；刁晏斌（2021b、c）則立足於馬來西亞華語，對華、普之間的隱性差異進行了較大範圍的調查，內容涉及詞的概念義、語法義和色彩義等，從而形成一個以往所無、具有類化特徵的觀察和分析角度，由此也把不同的差異現象聚為一類。此外，我們還立足於更大範圍，着眼於華語詞彙使用，從“捨”與“取”兩個角度進行更具綜合性的考察，主要涉及以下三種現象：“捨今取古”（刁晏斌，2021d）、“捨雙取單”（刁晏斌，2022d），以及“捨小取大”（刁晏斌，2022e、f）。此外，我們所做過

的具有類似性質的研究還有華語詞彙的“外來移植義”系列。（刁晏斌，2021e、f）

初步的研究實績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上述三點改變既是華語本體研究的很大進步，同時也啟發和推動研究者們在更大的範圍內、更多的維度上進行具有華語特色的本體研究。

其次，再看理論研究方面。

這裡的“理論研究”，指的是結合華語事實的具有理論內涵的建構及相關探索。如前所述，我們提出“全球華語學”概念，旨在倡導、加強華語研究的理論追求和建設，而在這方面，“社區詞”概念的提出以及持續不斷的後續探討，既為華語理論研究開了一個好頭，同時也初步彰顯了其巨大的開拓空間和良好的發展前景。刁晏斌（2022g）對“社區詞”由最初的詞彙學概念到後來的具有普通語言學內涵概念的發展過程進行了較為細緻的梳理，而這一曲折的發展歷程也會帶給我們很多的啟發。然而，到目前為止，這樣的相對成形、比較完整的理論研究成果並不多見。

另外，上述華語的體系建構範疇內的很多研究，往往也是結合具體的語言事實，而其由此提出的概念以及得出的結論和認識等往往也都具有很強的理論色彩，甚至本身就形成相對完整的理論表述，並且還具有很大的進一步拓展空間。比如，李計偉、張翠玲（2019）立足於東南亞華語特徵，探討了傳承語（按即祖語）的保守性及其對前者的影響，而這對於認識東南亞華語作為祖語的表現及其特點，對於認識祖語及其特點，無疑都極有意義和價值。

如果說，上述社區詞理論等屬於“本體論”的話，那麼華語理論研究中還有不少“方法論”的探索，多是結合具體語言事實的分析而歸納總結的。刁晏斌（2022h）對此進行過總結，談及的具有方法論意義的研究方法有“直接對比”（刁晏斌，2015b）、“微

觀對比”（刁晏斌，2016）和“計算對比”（刁晏斌、鄒貞，2014），以及“指標分析”（謝永芳、張湘君，2015）、“參數分析”（鄧思穎，2018），此外還有華語研究的“五個視角”（刁晏斌，2022h）等。在這方面，身處馬來西亞的華語研究者王曉梅教授用力甚多，近年來先後提出了全球華語研究的“古、方、普、外”四個視角，馬來西亞華語語法的“歷時一共時”“書面語一口語”“共同語一方言”三維分析框架，以及分析馬來西亞華語特有詞語的“歷時一共時”“書面語一口語”“共同語一方言”“外語—華語”四個維度。（王曉梅，2019、2020；王曉梅、周清海，2022）

總之，與華語的體系建構一樣，華語的本體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績，同時也在不斷的自省和反思中探索、調整、提高，並向着更高的目標和境界不斷邁進。

二、前瞻：事實發掘與理論探索

本文作者曾經立足於自己的認識和研究基礎，主要着眼於本體，從“拓展”與“加深”兩個方面談及對未來華語研究的期許（刁晏斌，2020b），以下再從“事實發掘”和“理論探索”兩個方面，來談我們對華語研究進一步發展的意見和建議。

（一）華語事實的全面發掘

華語事實的全面發掘，需要在反思過往的基礎上有所調整，我們認為當下最重要的改變就是擴大研究範圍。

一是擴大研究地域範圍。如上所說，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東南亞特別是新馬地區，而現在人們對華語“全球”內涵的認識已經越來越普遍和深入，所以它的研究也應更具“全球性”特點，而這首先就應當表現在覆蓋面上。李宇明（2017）指出：“大

華語擁有多個華語變體，最重要的是大陸的普通話、臺灣的國語、港澳華語、新馬印尼汶萊華語等，北美華語正在形成，歐洲華語略有雛形。”面對上述“略有雛形”“正在形成”與“業已形成”的華語“三態”格局，如果只關注其中之一、甚至只是“之一”的一部分，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所以，華語研究的地域範圍應當不斷擴大。^[2]

二是擴大華語研究的內容範圍，這方面涉及的頭緒比較多，以下擇要舉例說明。

上文談到，當下的華語本體研究中已經出現“共時+歷時”和“差異+融合”等的勢頭，這大致屬於研究內容範圍的整體性擴展，即由原有的對象範圍擴大到與之相對應的對象範圍，從而形成實質性的拓展。然而，華語“歷時”和“融合”的研究還只能算剛剛起步，整體上還屬於有待開墾的新領域，因此應該成為下一步研究的重要着力點和增長點。對於歷時研究，刁晏斌（2022j）強調了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建立共時研究的歷時視角，二是對華語歷時發展進行相對獨立的研究，三是進行全球華語史的研究；至於融合現象，同樣也有非常豐富的內涵，既包括共時層面，也包括歷時層面，此外還有不少“難融合”以及“不融合”現象（刁晏斌，2023a），這些都應納入研究範圍。

上文還談到，以往研究以詞彙為主，語音方面成果很少，語法方面也有明顯不足，這顯然也是有待擴展的。就語法而言，祝曉宏（2014）指出，要在未來有所突破，以下幾方面的議題應該抓緊提上日程：一是基於書面語料庫的地區華語語法特點研究，二是語法變異研究，三是海外華語和普通話語法互動研究，四是語法接觸研究，五是口語語料庫的建設及口語語法調查，六是篇章語法研究。時至今日，隨着一些相關著作如祝曉宏（2016）、陸儉明（2018），以及全球華語語法研究《香港卷》《馬

來西亞卷》和《美國卷》等的陸續出版，^[3]上述狀況雖然略有改觀，但是總體而言還是遠遠不夠的。

再就更加具體的範圍來看，即使在詞彙方面，其研究內容也還應進一步擴展。周清海（2017）指出相關研究中有三個方面的偏差與不足：一是專注於各地華語“變”了什麼，卻忽略了其“不變”的部分；二是專注於各地華語“有”而普通話“沒有”的現象，卻忽略了普通話“有”而各地華語“沒有”的現象；三是口語研究有待展開。以上三點中，前兩點差不多是同一問題的兩方面表現，都反映了差異現象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而其造成原因，則是只立足於普通話圈來看國/華語圈，而未能同時也從後者看前者，以及進行二者之間的互相觀照。作為不同的社會/地域/功能變體，普通話圈與國/華語圈語言的發展變化並不同步，由此就形成二者之間“有”與“無”、“變”與“不變”等諸多方面的參差不齊，在這種情況下，僅由一個角度來觀察，僅就一個方面來分析，自然不夠全面，難以形成對各種差異現象及其表現的全面把握。

至於口語，則是另一個亟待擴展和加強的方面。周文接下來談到口語研究有待開展的原因：“華語的書面語比較穩定，口語卻是變化最大的，受當地不同語言的影響也最多。”除此之外，華語口語還有不少其他特點，比如陳重瑜（1993）列出新加坡華語詞語使用的十一個特徵，其中第七個是“口語中出現書面語”；而周清海（2014）也指出，華語中“古今雜糅”現象書面語比口語要多些，“南北混合”的現象口語恐怕要比書面語多些。以上事實說明，華語口語有其與書面語不同的特點，因此值得而且應該進行專門的研究；另一方面，華語包括書面語和口語，缺少了後者的華語研究充其量只能撐起它的“半壁江山”。

除以上各個方面外，如果立足於具體現象，華

語的研究內容範圍也應該而且可以進一步拓展，不斷地見他人所未見、發他人所未發。比如，上文提及的“隱性差異”“外來移植義”以及“捨”與“取”的系列現象及其研究，大致屬於此類。此外，我們還曾經討論過華語詞彙運用中的“同義連文”（刁晏斌，2022i），也是一種以往研究從未涉及而又非常獨特的華語詞彙運用現象。

（二）華語理論的進一步探索

進行理論探索，建構全球華語學，應該是華語研究者不懈的追求，同時也應始終貫穿在華語體系建構與本體研究之中，成為其重要的一翼。

就華語體系建構而言，其本身就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在這方面，自然還有很多工作可做、要做，以下只舉例性地談兩個方面。

第一，厘清概念內涵，加強其科學性。

董紅晶（2018）指出：“正確的思維要求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要明確，而要達到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明確，要想對事物有清晰準確的認識，就要求我們進行不斷的實踐和反復的認知。”這一點，對華語體系建構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們當下的研究和使用中，有些概念稱名及其表述還不夠完善，以下就以“大 / 全球華語”的定義為例進行說明。

對於“大華語”之名，我們已經作過專門討論，認為它並不是一個特別合適的概念指稱形式（刁晏斌，2008：11 – 12、24）；而以下主要就比較通行的“以普通話／國語為基礎的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這一定義進行討論。

按一般的理解，所謂“基礎”，義指“事物發展的根本或起點”（見《現代漢語詞典》），也就是說，它只是事物發展的根本或起點，而不是事物本身。全世界華人當然也包括中國人，所以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自然也包括普通話，^[4] 這樣，當我們說大華語或全球華語“以普通話為基礎”時，就有偷換概念（縮

小概念外延）之嫌：一方面說普通話也包括在華語之中，另一方面當說它是華語基礎時其實已經把它排除在外了，因為普通話不能自己做自己的基礎。說華語以普通話 / 國語為基礎，雖然一定程度上規避了上述問題，擴大了迴旋餘地，但似乎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比如提出“雙基礎”，並說明是一種選擇關係，那麼怎樣選擇、依據是什麼？此外，“國語”的具體所指是什麼？^[5] 另外，前述華語有已經形成、正在形成和略有雛形三種形態，三者是否能夠與雙基礎中的一個或兩個完全對應？就正在形成的北美華語而言，基本有大陸 / 內地普通話、港澳粵語和臺灣國語三大背景（陶紅印，2022：3），也可以說是有三個基礎，而李宇明（2017）把臺灣國語、港澳華語並列，這樣基本就把後者排除在北美華語的“基礎”之外了。

刁晏斌（2015c）認為，華語有歷史和現實兩個不同的基礎，並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論證，結合這樣的認識以及實際情況，文中最終給出的華語定義是“以傳統國語為基礎、以普通話為核心的華人共同語”。這個定義或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述矛盾，但是也存在另外的問題，這一點我們下邊再說。

我們現在的認識是，給華語下定義，必須首先明確和堅持以下兩個原則：

一是包容性原則。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即應以全球為範圍，應當適用於全球範圍內的所有華語變體。如果以上引李宇明（2017）的華語“三態”說來看刁晏斌（2015c）的定義，其中的“以傳統國語為基礎”顯然不適用或不完全適用於“略有雛形”和“正在形成”的華語，其最大可能的適用範圍也只是“業已形成”的華語，因此顯然不具有能夠覆蓋整個華語的包容性。至於上述的另外兩個定義，同樣也存在這一問題。

二是現實性原則。這裡主要強調的是面對華語、

特別是華語研究的現實。一般的定義原則，是首先給出一個明確的性質所屬，然後通過添加修飾限定語的方式來明確其內涵與外延，從而區別於其他同類或相近的概念。比如，“語言”的定義方式就是如此：人們首先明確它是一種“工具”或“符號系統”，然後再進一步指出它是一種什麼樣的“工具”或“符號系統”。就已有的各種“語言”定義而言，^[6]相互之間的差異一方面來自不同人的不同認知，另一方面也來自語言研究階段性的限制或支援，即認識的提高或進步，會以定義的方式體現出來。就現實狀況而言，華語本身異常複雜，而已有的研究和認識還比較有限，二者疊加在一起，就使得我們在現階段還很難給出一個內涵豐富、外延清晰的定義，所以只能“面對現實”。

基於以上兩個原則，我們認為目前華語可以暫時定義為“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而這基本也是我們所見不同定義中的共同部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人對華語根本屬性的基本認識。這個定義一方面可以滿足目前基本的使用要求（即具有跟其他概念相區分的唯一性），同時也為隨着研究深入、認識提高而添加新內涵預留了足夠的空間。

第二，圍繞已有概念體系，進行全面、深入研究，最終做出立足華語事實、屬於華語學者的獨特貢獻。

其實，我們在這方面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基礎。比如，郭熙（2017）在“祖語”概念下建立了一個相當完整的概念鏈術語群，具體包括“祖語現象、祖語能力、祖語生、祖語政策、祖語中斷、祖語傳承、祖語崇拜、祖語文化、祖語使用者、祖語環境、祖語文獻、祖語生態、祖語維護、祖語景觀、祖語教育、祖語教學、祖語習得、祖語學習、祖語保持、祖語認同、祖語期待、祖語壓力、祖語焦慮（感）、祖語磨損、祖語失卻、祖語喪失、祖語消亡、祖語

共同體、祖語機制、祖語分化、祖語異化”。這樣長長的一個術語群，一方面反映了對華語作為祖語的內涵的全面認識；另一方面也等於列出了一個詳細的研究提綱。至於這一研究的意義和價值，郭熙（2021）指出：“華語作為祖語傳承的成功實踐，蘊藏着保護語言多樣性和語言文明交流互鑒的豐富經驗，是一筆寶貴的遺產，值得進一步挖掘。我們相信，圍繞華人祖語傳承的相關研究可以為祖語傳承這一世界性難題作出學術貢獻。”此外，郭熙、雷朔（2022）還進一步延伸、表述為“為世界語言傳承研究提供華語傳承的理論方法成果，引領該領域的學術話語權。”

祖語之外，上述郭熙、雷朔（2022）歸納的三個核心概念，即工具性、資源性和文化遺產性，都可以而且應該進行這樣的下位甚至下下位的梳理，以及以此為基礎的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從而取得更加豐碩的理論成果。

在華語本體研究中，理論探索大致可以分為從“使用”到“創造”的兩個層次、兩個方面。

所謂“使用”，就是放眼世界語言學，“為我所用”，嘗試使用更多的理論和方法，對華語事實及其發展變化進行充分觀察、充分描寫、充分解釋。比如，對義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亞等由新移民構成的華語社區語言進行研究，就需要考慮綜合運用社會語言學的變異調查、語料庫語言學、語言景觀研究等理論方法（郭熙、雷朔，2022）。我們所見，在已有的具體研究中，孫德平（2020）運用柯因內化理論，討論處於柯因內化前期的海外華語（以英國華人社區華語為例）的特點，得到了不少新認識；陳衛恒運用社會語言學的語言景觀研究理論和方法對美國洛杉磯地區華語景觀現象進行考察與分析，並且嘗試提出了“景觀語法學”概念，而其上位概念則是“景觀語言學”（陶紅印，2022：61—

75)，而這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就把“使用”和以下要說的“創造”結合起來了。但是，就目前所見，像這樣較富理論內涵的研究還不多見，所以這也理應成為今後努力的方向之一。

所謂“創造”，則是基於華語事實，以及對其充分的瞭解和認識，來試圖補充、完善已有理論，並爭取創造新理論。如上所述“社區詞”理論已經開了一個好頭，而基於無比豐富而又獨特的華語事實，一定會產生更多具有普通語言學內涵及價值的學術概念和學術思想。比如，陳保亞（2012）認為，馬來西亞語言的多樣性和接觸類型的獨特性，使馬來西亞成為東南亞甚至全世界最為獨特的語言地帶之一。文中就語言接觸類型的獨特性指出，馬來語與漢語的等勢接觸以及深度接觸模式在中國大陸很難觀察到，甚至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如此，因此具有很重要的接觸類型學意義，同時也有民族和文化類型學意義。再如，邢福義、汪國勝（2012）立足於語法，指出華語研究的理論目標：“通過對華語內部的不同變體、華語與外族語言的相互接觸以及華語的變異形態等問題的考察，力求得出一些關於語言發展的新的認識。”以上所說的“類型學意義”以及“新的認識”，都將成為基於華語事實及其研究而為世界語言學做出的新貢獻。

根據我們的初步瞭解和認識，以下一些立足並植根於華語本體研究的方面和內容，不僅極富理論內涵，而且極有可能對已有相關理論及知識體系產生積極影響，促使其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華語諸多獨特的詞彙及語法等表現對傳統的詞彙、語法理論及知識體系的影響；

華語獨特的形成過程及其發展變化模式對語言演化、語言發展理論的影響；

華語與外語、方言的長期、多元互動關係及其表現對語言接觸理論的影響；

華語各子社區之間的差異與融合現象及其發展變化對社會語言學理論的影響；

華語的全方位、多角度考察、分析實踐和探索對語言學方法論的影響。

進行華語理論的探索和創新，都是為構築全球華語學作出貢獻，並且最終將使之成為生長於華語沃土的一棵高大的理論之樹。

三、結語

郭熙、雷朔（2022）從另外的角度給出了對 40 年來華語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如果說既往對海外華語研究的重點在於討論什麼是華語、世界各地華語現實狀況如何的話，那麼，下一步則要更深入地思考華語是什麼。”從“什麼是華語”到“華語是什麼”，我們的理解是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改變，並有可能給華語研究帶來新的、更大的發展：

其一，從對華語內涵與外延的探討，到對其性質和特點的探尋與歸納總結；^[7]

其二，從解決基本的認識問題，到以此為基礎尋求更多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和關聯因素；

其三，從立足於外部世界看華語，到立足於華語看其與各種相關因素的深度互動關係；

其四，由相對基礎性、知識性的微觀或中觀歸總，到趨近於整體性、頂層設計式的宏觀把握。

另外，郭、雷文中還提到，需要思考在上述新的認識下可以做些什麼。這樣，實際上就把“知”與“行”結合了起來。對於下一步的“行”，文中給出的答案是：“重視海外華語的文化遺產屬性，重新認識海外華語研究的目標，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各區域華語的歷史發展和現狀，深化華語作為祖語的傳承理論和實踐研究，為實現文明交流互鑒服務。”“拓寬、深化和加強海外華語的變體描寫與

跨變體對比研究，歸納變體特徵與變體共性，助力海外華語的傳承和傳播；搶救性搜集和保護華語文獻等寶貴資源，拓展全球華語研究的歷時空間，從傳承、接觸、自身獨特發展等角度考察華語變體的發展和變異過程。”以上表述宏觀、微觀兼具，手段、目標清晰，對華語研究今後的發展極具指導意義。

筆者最近借用普通話語法研究的已有理念和認識，討論了全球華語研究的“地”與“天”，以及怎樣做到“立地+頂天”的問題（刁晏斌，2023b）。我們的基本認識是，華語事實的大地廣袤肥沃，既有待開墾，又需精耕細作；華語理論的天空遼闊高遠，既可扶搖直上，更可逍遙翱翔。華語研究的學術願景與追求，就是要把它真正當成一門學問來做，並且最終真正做成一門“立地頂天”的真學問、大學問。

對此，我們既滿懷期待，也充滿信心。

註釋：

[1] 見第十二屆全國語言文字應用學術研討會暨《語言文字應用》創刊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2022年11月19-20日）大會報告《試論海外華語傳承話語體系的構建》。

[2] 這裡其實還遠不僅僅是一個覆蓋範圍的問題，上述“三態”大致構成了一個華語發展的“連續統”，由此可以對其形成與發展進行連續性的觀察，進行更具理論性與創新性的研究，而這無疑具有更大的學術意義和價值。

[3] 這是邢福義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結項成果中的一部分，均由商務印書館於2021至2022年間出版。另外三部即《新加坡卷》《臺灣卷》和《澳門卷》待出版。

[4] 關於這一點，人們現在已經達成共識。

[5] 到李宇明（2017），才明確指出這裡作為“基礎”的國語既包括“老國語”即我們一般所說的“傳統/早期國語”，也包括當下臺灣地區正在使用的臺

灣國語。

[6] 潘文國（2001）一共列出了古今中外68種關於語言的定義，可以參考。

[7] 筆者曾就這個問題向郭熙先生請教，此點基本是郭先生回饋的主要內容。

參考文獻：

陳保亞 2012 馬來西亞多語現象：一種獨特的接觸類型，（馬來西亞）《當代評論》第2期。

陳重瑜 1993 新加坡華語——語法與詞彙特徵，見陳重瑜《華語研究論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華語研究中心。

鄧思穎 2018 全球華語詞彙研究的參數分析——以“點算”為例，《漢語學報》第4期。

刁晏斌 侯潤婕 2016 從餐食類名詞看全球華語的共同基礎，《漢語學報》第3期。

刁晏斌 鄒貞 2014 基於計算的海峽兩岸女性譯名性別義溢出情況對比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

刁晏斌 1997 新時期大陸漢語與海外漢語的融合及其原因，《遼寧師大學報》第4期。

刁晏斌 2000 差異與融合——海峽兩岸語言應用對比，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刁晏斌 2015a 臺灣“國語”詞彙與大陸普通話趨同現象調查，《中國語文》第3期。

刁晏斌 2015b 試論兩岸語言“直接對比”研究，《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

刁晏斌 2015c 論全球華語的基礎及內涵，《Global Chinese》（《全球華語》）第1期。

刁晏斌 2016 再論海峽兩岸語言微觀對比研究，《文化學刊》第8期

刁晏斌 2017a 試論建立“全球華語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語言戰略研究》第4期

刁晏斌 2017b 論全球華語史及其研究，《Global Chinese》（《全球華語》）第2期

刁晏斌 2017c 海峽兩岸語言融合的歷時考察，《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

刁晏斌 2018 全球華語的理論建構與實證研究，

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

刁晏斌 2020a 東南亞華語初期發展變化考察，*Global Chinese*（《全球華語》）第 1 期。

刁晏斌 2020b 論全球華語研究的拓展與加深，《華文教學與研究》第 1 期。

刁晏斌 2021a 東南亞華語詞彙發展演變初探，（香港）《語文建設通訊》總第 124 期。

刁晏斌 2021b 論華語與普通話詞彙的隱性差異——以馬來西亞華語為例，《華文教學與研究》第 2 期

刁晏斌 2021c 再論華語詞彙與普通話的隱性差異，《漢語學習》第 2 期。

刁晏斌 2021d 論華語詞彙運用中的“捨今取古”現象，《漢字漢語研究》第 3 期。

刁晏斌 2021e 論華語詞彙中的外來移植義——以馬來西亞華語為例，《語言文字應用》第 1 期。

刁晏斌 2021f 再論華語詞彙中的外來移植義，《世界華文教育》第 1 期。

刁晏斌 2022a 東南亞華語早期樣貌考察與分析，《語言文字應用》第 2 期。

刁晏斌 2022b 由“捨今取古”現象看華語與早期國語的一致性，《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

刁晏斌 2022c 普通話的“輸入”與全球華語的融合——基於《馬來西亞華語特有詞語詞典》的調查，《*Global Chinese*（《全球華語》）第 2 期。

刁晏斌 2022d 論華語詞彙運用中的“捨雙取單”現象，（新加坡）《華文學刊》第 1 期。

刁晏斌 2022e 論華語詞彙運用中的“捨小取大”現象，《通化師範學院學報》第 1 期。

刁晏斌 2022f 由“捨小取大”現象看新馬華語詞彙特點，《大慶師範學院學報》第 2 期。

刁晏斌 2022g 社區詞理論：已有進展及進一步研究的思考，《語文研究》第 2 期。

刁晏斌 2022h 華語研究方法論的探索與思考，《華文教學與研究》第 3 期。

刁晏斌 2022i 論華語詞彙及其運用中的“同義連文”現象，《語言文學》第 1 輯，南京：鳳凰出版社。

刁晏斌 2022j 論華語及其研究的歷時觀，《武陵學刊》第 3 期。

刁晏斌 2023a 華語融合研究：已有進展及進一步發展的思考，《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刁晏斌 2023b “立地 頂天”：全球華語研究的學術願景與追求，《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董紅晶 2018 術語概念體系構建的若干理論問題探究——以術語“詞彙學”“詞彙意義”為例，《中國科技術語》第 1 期。

郭熙 2011 對華語語言生活的觀察與思考——暨南大學華文學院院長、海外華語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訪談錄，《華文教學與研究》第 4 期。

郭熙 2017 論祖語與祖語傳承，《語言戰略研究》第 3 期。

郭熙 2021 華語與華語傳承研究再出發，《語言戰略研究》第 4 期。

郭熙 雷朔 2022 論海外華語的文化遺產價值和研究領域拓展，《語言文字應用》第 2 期。

洪爽 2022 普通話詞語對港式中文的影響及表現，《*Global Chinese*（《全球華語》）第 1 期。

李權 2020 早期東南亞華語的幾種數量表達形式及其發展，《*Global Chinese*（《全球華語》）第 2 期。

李權 2022 早期國語的域外傳播與東南亞華語的形成發展研究——以華文報刊為中心，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李計偉 劉燕婧 2021 新馬華語史的一個斷面：以《蕉風》（1955-1970）為語料的考察，《*Global Chinese*（《全球華語》）第 2 期。

李計偉 張翠玲 2019 傳承語的保守性與東南亞華語特徵，《華文教學與研究》第 3 期。

李計偉 2012 論東南亞華語中的“以策+X”格式，《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第 3 期。

李計偉 2018 大華語視域中“幫忙”用法的共時差異與歷時變化，《漢語學報》第 4 期。

李計偉 2022 大華語視域中“向+NP+VP”結構的共時差異與歷時變化，《語言文字應用》第 2 期。

李行健 2013 兩岸差異詞再認識，《北華大學學報》第 6 期。

李宇明 2014 漢語的層級變化，《中國語文》

第 期。

李宇明 2017 大華語：全球華人的共同語，《語言文字應用》第 1 期。

劉善濤 黨懷興 2020 “全球華語學”建設勢在必行，《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4.28

盧月麗 2020 新馬華語“被”字式歷時考察，《Global Chinese》（《全球華語》）第 2 期。

盧月麗 2022a 2021 年度華語研究綜述，《Global Chinese》（《全球華語》）第 2 期。

盧月麗 2022b 新馬華語語法發展演變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盧月麗 2022c 新馬華語餐食類名詞作謂語的歷時考察，《現代語文》第 9 期。

陸儉明 2005 漢語走向世界與“大華語”概念，《中國社會語言學》第 2 期。

陸儉明 2018 新加坡華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潘文國 2001 語言的定義，《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 1 期。

彭劍 楊文全 2021 新馬華語特色量詞“粒”的生成衍化與接觸融合，《語言文字應用》第 1 期。

錢學敏 2004 錢學森關於複雜系統與大成智慧的理論，《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

邱克威 2014 《叻報》的詞語特點及其詞彙學價值管窺，《語言研究》第 4 期。

邵敬敏 劉杰 2008 從“手機”看不同華語社區同義詞群的競爭與選擇，《語文研究》第 4 期。

沈索超 王輝 2022 我國華語研究的知識圖譜分析（1998—2020 年），《中國語言戰略》第 1 期。

盛玉麒 2012 香港社區詞與當代漢語流通詞彙交集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

蘇金智 王立 儲澤祥 2015 從兩岸學生詞語知曉度及其使用情況調查看詞彙融合趨勢，《語言文字應用》第 1 期。

孫德平 2020 柯因內化前期海外華語特點研究——以英國華人社區華語為例，《語言研究》第 1 期。

陶紅印 2022 全球華語語法·美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彩雲 2015 馬來西亞華語介詞的變異，《漢語學報》第 2 期。

王彩雲 2016 馬來西亞華語助詞的變異，《華文教學與研究》第 2 期。

王文豪 2020 從致使動詞到目的連詞——海外華語中“俾”字句的來源及演變，《語言科學》第 3 期。

王曉梅 張欣怡 2019 華語區與普通話區的共時融合——兼談全球華語社區跨區互動的方法論，《華文教學與研究》第 2 期。

王曉梅 周清海 2022 馬來西亞華語特有詞語考察——以《馬來西亞華語特有詞語詞典》為例，《Global Chinese》（《全球華語》）第 1 期。

王曉梅 2017 全球華語國外研究綜述，《語言戰略研究》第 1 期。

王曉梅 2019 “古、方、普、外”——論全球華語研究的四個視角，《Global Chinese》（《全球華語》）第 1 期。

王曉梅 2020 馬來西亞華語語法的三維分析框架——以有標差比句為例，《華文教學與研究》第 2 期。

謝永芳 張湘君 2015 華語社區同實異稱的比較與測量，《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

邢福義 汪國勝 2012 全球華語語法研究的基本構想，《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6 期。

徐杰 王惠 2004 現代華語概論，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

徐威雄 2012 馬新華語的歷史考察：從十九世紀末到 1919 年，《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總第 15 期。

周清海 2014 華語教學與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5 期。

周清海 2017 “大華語”與語言研究，《漢語學報》第 2 期。

祝曉宏 周同燕 2017 全球華語國內研究綜述，《語言戰略研究》第 1 期。

祝曉宏 2014 海外華語語法研究：現狀、問題及前瞻，《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祝曉宏 2016 新加坡華語語法變異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祝曉宏 2021 近十餘年來的華語研究：回顧與前瞻，《語言文字應用》第 2 期。

刁晏斌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diaoyanbin@sina.com